

## 金沙江畔，一座古城的沉没与新生

聂作平

在山地，光阴的脚步似乎要比在平原和盆地更缓慢。上午9点半，心事重重的太阳终于爬上了书楼镇对面的山梁。锋利的光线切开薄薄的雾气，把古城里的牌坊、门楼和院墙的影子，重重叠叠地压在一起。鸟雀在邻近树梢上叫，桂花的幽香若有若无，三五个居民坐在阳光下喝茶说闲话。古城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是前一天深夜来到书楼的。汽车自宜宾市溯金沙江沿山路而上，一面是悬崖和台地，台地上，见缝插针地挤着一些农舍。一面是静水深流的金沙江，尖起耳朵，隐约听到江水呜咽。夜深人静时，司机说，书楼就要到了。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，透过车窗，我看到黑黝黝的山谷里，漂浮着几星灯火，恰好与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遥相呼应。

尽管第一次到书楼，但我知道，这是一座陷落在大山深处和时光深处的古城，在这座古城，曾有过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……

## 从马湖到中都

通过一叠老照片，我“认识”了一座老县城。

时光定格的市景，与我记忆中二十多年前的南方小县城并无太大差异：一条稍宽的主街，两旁是当时还算时尚的七八层楼房。更多的是狭窄的小巷，木制的吊脚楼和板房挤向街心，坐在家门口的老人和蹦蹦跳跳的孩子，以及从院墙上或篱笆上垂下来的花朵，无不显示出生活的宁静、缓慢和安详。

如果说独特之处的话，那么，这座如今只存在于影像中的老县城，它的房屋和街道坐落于一条曲折的大江之滨，城市依山就势，铺排在江岸的几进台地上。此外，几座看上去形制简陋的城门，保存完好，从视角的飞檐到朱红的门楼，以及黑黝黝的匾额都能看出，它已然历尽了岁月沧桑。

如果追溯这座边城的前世，早在700多年前的元朝，当这里成为管辖川南和滇东北大片地区的马湖路治所时，朝廷就在逼仄的台地上修筑了一座土城。简陋的土城，曾是方圆几百里内首屈一指的首府。到了明朝中期，马湖路变为马湖府，土城甃以砖石，建成了一道高一丈五，厚一丈，周长七百七十四丈（相当于两公里半）的城墙。城墙上，开有五道城门。城门上，各建一座城楼。很多年后，通过老照片，我们还能一睹它昔日的风采。

这座如今已沉没于金沙江浩荡江水中的古城，就是曾经的马湖路、马湖府以及屏山县的路治、府治、县治所在地，名曰泥溪镇（今天的宜宾叙州区也有一镇名泥溪，但与屏山泥溪非一地，相距近100公里）。

泥溪以及马湖路、府治海桑田般的变迁，得从大山深处一面镜子般的湖泊说起。

话说距书楼镇120余公里的西南方向凉山腹地，山岭纵横，沟谷深切，长江的上游河段金沙江及其支流就从群峰围困中夺路而来。在金沙江左岸，早年的一次强烈地震，造成山谷崩塌，将一条支流阻塞，造就了一方面积约7平方公里、平均水深7米的湖泊。按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说法，旧时，有人看到龙马出没水中，故而命名为马湖。

今天，马湖因其秀美的湖光山色成为川中知名景区，但那些流连于自然风光的游客很少知道，历史上，有一个以马湖为名的行政机构——从元朝的马湖路到明朝的马湖府——曾经管辖了包括马湖在内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区，并成为联结内地与民族地区的桥梁、汉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汇的前缘。

倘若从成都出发向正南方而行，将次第经过平原、丘陵和山地。在屏山境内，四川盆地与川西南山地及滇东高原缝合——屏山东部和北部临川南丘陵，西部接川西南山地，南部联滇东高原。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，呈东北—西南走向的大凉山与五莲峰一西一东，裹挟着千山万壑横亘于川南与滇东，而自西南向东北流淌的金沙江就穿行于两列山脉之间。山脉的尽头，金沙江由峡谷中猛虎般的狂暴变得稍为平缓时，便进入了屏山县境。

如同绝大多数崎岖山地一样，但凡河谷冲积平原或是山间台地，一般都会成为人烟稠密的村落和市镇。屏山亦然。屏山下辖的中都镇就坐落于两山对峙的中都河谷。站在高处，我看到的是一座杂乱无章的边地小镇，但在历史上，中都曾有过它的显赫时光。

秋日雨后，一个当地朋友带我来到中都镇上的一座古老庭院。尽管庭院看上去破旧不堪，但建筑形制还隐约透露出它曾经的考究与大气。这就是当地人称为黑龙洞的黑龙土主庙。

所谓土主庙，按《南诏野史》的说法是：开元元年（713年），唐朝“授皮逻阁为特进，封台登郡王……开元二年，立土主庙”。学者考据认为，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土主庙和土主信仰，起始于唐时的南诏，云南巍宝山巡山土主庙便是各地土主庙的源头。

通俗地讲，土主相当于一个地区的守护神。这种起自唐朝的习俗传到后来，最信仰土主的是居于四川和云南的彝族。我看到的中都镇黑龙土主庙，它供奉的土主，就是彝族先人，名叫腊曲。

腊曲是一位彝族首领，生活于北宋末年。当时，边地战乱不休，他率众保境安民，不幸战死沙场，宋徽宗将其封为黑龙土主，并下旨立祠纪念。埋葬腊曲的坟几十年前犹存，当地人称为大坟包。据说，宽大的墓室能容纳200人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还有人利用墓室开挖鸦片烟馆。

彝族黑龙土主庙是一个暗示，它暗示处于凉山山脉地带的屏山，乃是彝汉交界、彝汉文化碰撞的边缘地带。作为多民族文化的结合部，中都以及屏山的民族与文化交流史其实还可由宋朝往前推1000多年。

犍为是距屏山不到100公里的另一个县，中间只隔着沐川——事实上，沐川也是从屏山划出去的。在犍为一个叫万年村的地方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出土了数量丰富的文物。其中，最引人



▲文昌行祠遗迹。



▲重建的马湖府城楼。聂作平摄

注目的是一枚玉纹铜印。铜印上刻着一轮弯月，月是禾苗和杜鹃鸟的图案。这些神秘的图案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

经辨识，考古家们确认，这就是考古界众所周知的巴蜀图语。所谓巴蜀图语，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，是在四川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的一些图形符号。目前主流观点认为，巴蜀图语是远古的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，近似于象形文字，是古文字的雏形。据推断，巴蜀图语可能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。

史载，古蜀国第一位蜀王称望帝，名杜宇。传说，杜宇在蜀地首创了按农事季节耕种的制度，后人奉为农神。他在成都平原建立古蜀国时，立都郫县。杜宇死后，精魂化为杜鹃，每到春耕时节，总是在田野里大声啼叫，提醒后人及时耕种，莫忘农时。

玉纹铜印上的图案，描绘的就是杜宇化鹃，教民耕种的故事。

杜宇的国都在郫县，为什么他的故事会在200多公里外的犍为流传，并被庄重地刻到铜印上呢？《蜀王本纪》记载：“时蜀民稀少，后有男子名杜宇，从天堕止朱提……宇自立为蜀王，号曰望帝。”从天堕是后人对他的神化，但朱提却实有其地，那就是今天的云南昭通。

综合各种史料可知，原本居于昭通的杜宇部族，沿金沙江北上宜宾后，再溯岷江而上，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，而屏山，正是他们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必经之地。

中都乡又名沐道、夷都。文献记载，它曾是古蜀王的庶子夷氏的封地，所以才有夷都这个名字。当杜宇部族强盛时，他们一步步从滇东高原下到川南山地，经由屏山再进入四川盆地；当杜宇部族建立的古蜀国日益式微，并被秦国所灭后，残余民众又溯了祖先当年的道路，一步一步退回到包括屏山在内的川南山地及毗邻的凉山地区。因此，遥远的2000多年前，屏山一带既是古蜀王国的南大门，也是民族走廊上的一个重要节点。

## 土司的烙印

先秦时，马湖府的居民，一部分是如今已消失了的僰人，一部分是与杜宇同根同源的古蜀人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，四川盆地的汉族迁入屏山，并与当地人融合。隋唐时，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，称为马湖蛮。又因其首领姓董，称为董蛮。马湖蛮的势力中心在今天的马湖景区一带，碧波荡漾的马湖中那座形似螺髻的岛屿，可居数百人，便是马湖蛮的“首府”。宋朝时，马湖蛮分成两个支系，以安氏为首的一支与彝族融合，以文氏为代表的一支持续汉化。

古蜀人以土著自居，其势力中心在今天的屏山中都镇一带，由于与中央王朝摩擦不断，故被贬称夷都蛮。

元朝是中国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它的存续时间虽然还不到100年，却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影响之一就是一些原本游离于中央王朝之外的边疆地区，第一次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。大者如云南和西藏，小者如马湖。

1276年，也就是元灭南宋这一年，元朝设置马湖路（路是宋、金、元时的一级行政区划，宋、金时相当于后来的省，元时相当于府），治所设于溪口，即今天的屏山新市镇。

元朝对马湖的战略意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，这缘于设马湖路之前20年发生的两次血战：1256年，名将兀良合台奉蒙哥之命由云南昭通北上，打算占据金沙江下游（当时又称马湖江），顺江东下，破叙州、泸州后进逼南宋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堡垒：合川钓鱼城。

然而，尽管兀良合台在金沙江击败宋将张实的水军，夺得战船200艘，但当他乘势东下时，却遭到叙州知州史俊袭击，蒙军大败，不得不打消了合围钓鱼城的计划。

不过，虽然马湖路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，但因为是民族地区，实行的是土司制。

所谓土司制，按《辞海》定义，乃是“南宋、元、明、清各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。”自秦朝推行郡县制后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就是派出各级官员（称为流官），但在鞭长莫及的少数民族地区，则实行民族首领世袭制（称为土官），而土司，正是民间对各种土官的俗称。

1884年，英国驻成都首任总领事谢立山为了

以明朝为例，按级别不同，土司衙门分为宣慰使司、宣抚使司、安抚使司和长官司等，以及土府和土县。相应的，其长官分别称为宣慰使、宣抚使、安抚使和长官（此为武职），以及土知府和土知县（此为文职）。不论武职还是文职，老百姓笼统称为土司。这些土司“世守其土，世长其民，世袭其职”。尽管他们的承续需经朝廷批准，并按规定向朝廷敬献贡物，但在其统治区域内，有着生杀予夺的特权，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的小王国。

元朝时，马湖路下辖6个长官司，同时还管辖戎州和长宁军。20余年后，马湖路治所迁到泥溪，即后来的屏山县城。明朝立国后，废路设府，拉开了马湖府长达300多年的序幕。马湖府也实行土司制，土知府由安氏家族世袭，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1495年，安氏家族叛乱，朝廷才改土归流。马湖府下辖的长官司，也由元朝的6个变成了明、清的4个，分别为蛮夷、平夷、泥溪和沐川。其辖区“东一百一十里至宜宾界，西一千二百里至建昌界，南一百四十里至乌蒙界，北一百三十里至宜宾竹崖门界”。大致包括今天四川的屏山、马边、沐川、雷波和云南的永善、绥江、水富等县。

毋庸置疑，多民族聚居区，常会因文化、风俗、经济及其他原因发生血流冲突。马湖史上，小到聚族械斗，大到正规军讨伐都屡见不鲜，其中以发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“三雄”之乱影响最为深远。

中都镇郊外的山野里，有一座当地人称为顾将军坟的古墓。墓前，褐黄色的碑上大书：“前明敕授怀远将军顾公讳国璫老人之墓”。这位明朝时做过怀远将军的顾国璫，就是当地人口相传的顾将军。

明朝万历年间的西南地区发生了多次土司或部族头领叛乱，为此，朝廷不得不连年用兵，“三雄”之乱即为其中一次。

“三雄”之乱，指凉山和马湖地区的撒假、安兴（即马湖府知府后人）、杨九乍三人结成联盟，号称“三雄”。“三雄”于1587年起兵反明，撒假自立为西蜀平王。朝廷闻讯，先派都司李献忠率兵三千讨伐，“三雄”降李，献忠等人被杀。朝廷震怒，另派总兵李应祥率两万大军进剿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征战，“三雄”先后或擒或杀，叛乱才告一段落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，导致大量民众死于非命，当时的记载是尸积如山。朝廷也为此次付出巨大代价，除了“数百万帑金轻掷于不毛之地”外，还有大批将士战死沙场，埋葬于中都镇外的顾将军，即为死难者之一。

为了更好地把控边地，屏山便隐隐然有军事要塞的功能。就在平定“三雄”之乱次年，朝廷下令新设屏山县，同时将叙马沪军备道从长宁移驻屏山，由四川总兵李应祥兼任，相当于把一个省级行政区的“司令部”设在了一座边远小城。

屏山原本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多民族混居区。清朝以后，随着僰人、古蜀人的消亡和汉化，以及彝族向大、小凉山迁徙，屏山虽然还保留着土司统治，但已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地区。

然而，屏山得地利之便的优势，反而更加彰显，也使得屏山愈发重要。

在屏山通往马边的公路旁，有一片高耸的红色悬崖，名叫洪溪岩。经人指点，我找到了崖下一长满青苔和杂草的古道，青石板砌成的古道宽一米多，斗折蛇行，蜿蜒在空寂阴冷的山中。尽管如今半天也看不到一个行人，但青石板上深深的履痕和岩石上刻写的“永赖同功”的摩崖题记，却还可以想象它当年人们来往的辉煌。这条古道，称为马湖路，明朝万历年期间由安边同知汪京所修。马湖路从屏山出发，一路经新市、中都等地，连接马边，经由马边，深入到更为遥远的凉山腹地。史料记载，三国时诸葛亮南征，其中一支部队，就沿此路深入不毛。

像这样的古道，在屏山境内还有多条，最重要的包括：

其一，从宜宾沿江而上，经楼东和泥溪，再至新市和屏边，抵达今天的屏山新市镇。清明时，滇东北一带生产的铜，就沿此路而出，抵达屏山后顺金沙江运往内地。如金沙江下游河段的航运，仍然很早就开始了。如《宋会要》记载：“淳熙八年七月十八日，臣僚言，马湖生蛮……常年中马，操舟顺流直抵叙州府城下。”淳熙八年即1181年，哪怕从这一年算起，金沙江下游河段的通航，也有将近900年了。

元朝以后，历代对疏通金沙江下游航道均十分重视，先后多次整治了江中的礁石和险滩。

其原因，一方面在于马湖在军事上控扼凉山的重要意义，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航运，将产自滇东北的铜外运。由于江流湍急，滩险水恶，很长时期内，金沙江下游只能行驶载重60吨以下的木船，并且，上水时必须依靠纤夫。

在我老家，纤夫和矿工被认为是两种最危险、最艰苦的工作。纤夫是“死了埋没”，矿工是“埋了没死”。而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，屏山沿江各村镇的不少壮年男子，大多以拉纤为生。今天的金沙江两岸，危岩矗立，杂草丛生，但如果足够仔细的话，还能发现在那些原本没有路的地方，纤夫们用双脚踩出的又陡又窄的小路：纤道。

与纤道一同见证那段岁月的，还有船工号子，也就是纤夫们拉纤时高声唱出的歌谣。上世纪70年代，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到宜宾采风，听了原汁原味的金沙江船工号子后，创作并演唱了后来风靡一时的《川江号子》。

1942年，民生公司的一艘轮船从宜宾溯流而上，抵达屏山，之后又继续上行，抵达新市，这是金沙江上第一次出现机动船的身影。从那以后，机动船慢慢取代了木船，纤夫的身影消失了，纤道荒废了，高亢的船工号子不再回荡，转而成为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下游河段，不仅是万里长江上舟楫可以通达的尽头，也曾是另一种出产于马湖府的特产的进京通道。这种特产就是楠木。凡去北京故宫的游人，多半对大殿里那些巨大的房柱印象深刻。这些由整根木头制成的房柱，都是珍贵的楠木，民间称为金丝楠，其中相当一部分，就来自马湖。

屏山中部横亘着一列雄浑的山脉，主峰海拔2000余米，名叫五指山，是凉山余脉。不过，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，它不叫五指山，人称神木山。

《大明一统志》说：“神木山，在沐川长官司西二十里，旧名黄种葛溪山，本朝永乐四年，伐楠木于此山，一夕楠木不假人力移数里，遂封为神木山，岁时祭之。”

据当地人讲，中都镇河对岸的一座山上，曾建有神木山祠（这也是当时祭祀的证据），祠里有一块《神木山祠记》石碑，石碑于上世纪被毁，但上面的文字，却在地方史料里记载下来。

碑文比《大明一统志》的记述更详细，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：明朝初年，朝廷下令在山上砍伐楠木。高大的楠木沉重无比，而山间要这么小路，要么连小路也没有，要把它运出去，自然千难万险。“逾寻丈者数株，计庸万夫乃可以运。”没想到，有一天夜里，一些楠木竟然像长了脚一样，自己移动到大路上。并且，沿途草木没有一根因此被折断。如此神迹，当地官员急忙上奏朝廷，皇帝认为是祥瑞，于是将黄种葛溪山封为神木山。

尽管有碑有祠有史料，但这仍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。真实的历史是，明朝初年修建南京的明孝陵和紫禁城，以及乾隆时修建圆明园，都从神木山砍伐楠木。如《四川通志》记载：“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，四川总督鄂尔泰进正楠木二十根，余木两根，富顺县宰、屏山巡检运送进京，送至圆明园交收……乾隆三十年，又于屏山县、雷波县等处采办大楠木三十六根……运进京，送至圆明园金收。”

庞然大物般的楠木，一根就有上千斤，在缺少现代工具的明清，该如何把它送往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呢？

能够借助的，便是滔滔不息的江水。首先，自神木山上砍伐的楠木，通过在山间开辟的沟槽滑行到山脚，再由人力抬往中都河边，并将它放进河里。楠木顺水漂至新市，再将楠木数根或十多根绑扎在一起，形成一只木筏。木筏上面，搭起简陋的窝棚，放筏的工人以及押送的官员吃住都在上面。他们驾驶着这些木筏，顺着金沙江，过宜宾，下重庆，出三峡，越湖北、江西、安徽，直到扬州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，转而沿运河北上，抵达京东张家湾，上岸后搬运至崇文门神木加工厂。

依山临水的新市，既有金沙江的黄金水道，又有陆路东达屏山、宜宾，北至马边、犍为，南进雷波，西下凉山，因而历来便是军事重镇。元朝时，马湖路治一度设于此。后来，马湖府的六代大长官司之一的蛮夷司也设于此。明朝设驿马驿，清朝设巡检司，新中国成立后也驻有部队。在成昆铁路和雅西高速贯通之前，进出凉山，尤其是小凉山的美姑等地的大量物资都通过金沙江航运至新市，然后上岸转运。上世纪40年代